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青年项目

生态文化学与 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

李 钧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文化学与 30 年代小说主题研究/李钧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10
ISBN 7-81067-925-2

I. 生… II. 李…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1927~1937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8488 号

生态文化学与 30 年代小说主题研究

李 钧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266003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hdc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82032644(传真)

责任编辑 丽真 电 话 0532—82032846

印 制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 编委会

主任委员 王 敏

副主任委员 张全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成 尹慧敏 齐 涛

刘德龙 李天军 李新泰

张 华 蒿 峰

序一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 及其文本的成功尝试

朱德发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认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须同时显示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①自然科学的创新发明离不开研究主体这种充满张力的性格，社会科学的突破创新也需要研究主体具备这两方面的性格。因为唯有“维持传统”才能在汲取前人有益成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而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唯有“反对偶像崇拜”才能解放思想、超越自己、超越他人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李钧博士在其科研实践及其发表的学术成果中已显示出源自于主体发散型思维与收敛型思维相磨相荡之间所折射的张力性格，新著《生态文化学 与 30 年代小说主题研究》（以下简称《主题研究》）更是有力的明证。

《主题研究》，既是李钧博士完成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又是他在毕业论文答辩时被答辩委员会评定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它所研究的具体对象虽是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小说主题，而真正的学术目标却是从理论建构与写作实践的有机结合上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至少为重写 30 年代断代史作出成功的探索，也为整个文学史的全景观书写提供一个新颖独特的叙述范式。自上世纪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行为展开以来，在相当程度上解构了 50 年代形成的文学史观及其研究思维和书写范式，致使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步入一个新时期；不过一个新学术范式在超越传统范式的同时也必须接受传统范式的质询，也就是 80 年代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式怎样容纳既有文学史范式包涵的内容则成为重新检验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过程时的基本问题。正如库恩提出“范式”论所指出的，在评价“新”的研究范式比传统范式更为“合理”时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一个新范式要能被接受，就必须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根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

^① [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5 页。

力解释的论据。换言之,新范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解释更具有包容性。”^①“文革”前以左翼文学为重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模式与80年代后以五四新文学传统为核心的新文学史范式相比较,“前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期形成的,它的核心内容在于解释‘革命’为何成功,以及如何指导‘不断革命’的文学发展进程,因而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叙述以左翼革命文学为主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历史。而后者则是在以‘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新时期提出来的,它主要解释的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如何发生及其在一个世纪中的发展进程。”^②80年代后形成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范式是以五四启蒙文学作为核心标准的,虽然五四文学传统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有着深广的影响,但是它毕竟不能涵盖或贯穿全部现代中国文学史,既不能容纳五四之前与之后的现代中国多种样态的文学,更不能容纳以“否定”五四文学为前提而生成的30年代左翼文学。这说明以启蒙文学为核心内容的新文学史研究范式包容不了既有文学史范式的内涵,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及其写作范式才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学术范式呢?这正是《主题研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也是该专著的重要价值所在。

近几年,有关30年代文学尤其左翼文学的重读重写的理论成果或者史论并举的断代史书写已问世不少;与此同时也亮出了整体文学史观或新释的人的文学史观并形成了相应的叙述模式,这不仅深化了30年代文学的研究,而且拓展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格局。固然这些研究成果所显示的学术范式较之以左翼文学为核心的和以五四文学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具有宽容性和合理性,但是它没有完全突破既有范式的局限和偏颇。《主题研究》一书的著者以刻苦攻关的毅力和主动进击的精神,几乎查寻了几代学人对30年代文学探索的足迹,如痴如迷地翻阅了30年代文学的原始资料,从中发现新问题、新意蕴、新诗学和新信息,并把它们纳入以生态文化学文学史观所建构起的理论框架进行探幽发微的论析和纵横捭阖的探索,作出了一系列的具有创意的理论概括和具有相当深度的悟性阐发,营造了一部集多副面孔于一体的30年代小说史论,开创了将现代中国文学置于多元生态文化语境进行重新钩沉、重新梳理、重新评述、重新书写的新格局,从而显示出生态文化学文学史观及其研究范式比之于以前的文学史观及其书写模

① [美]A·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春季卷,1995年2月。

②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式更具有合理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一本著作或一篇论文有无学术价值和存在意义,重在是否有创新点,这是每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竭力追求的;但是学术创新谈何容易,其中的甘苦只有那些真诚的学者在科研实践中方可体验到。所以我们对待既成的研究成果,既不要轻看更不要矢口否定,应认真地阅读比较、辨识评判,哪怕有一个创新点也要予以肯定,这是对著者脑力的尊重,也是对自己人格的检验。在我看来,《主题研究》的创新度不只闪显于某些章节之中,而是体现于整体构成,因之难以寻觅出源于传统思维模式的陈腔套话,从观念理路到话语运作都给人以务实求新之感;不过最耀目的创新点则是借助“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根据 30 年代多元文学形态的特定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汲取多种学说的思想资源,加以合乎逻辑的理论整合,建构起“生态文化学”,并与 30 年代文学客观结构相契合而形成的“生态文化学”文学史观和真善美有机统一的价值坐标。这不仅为重写 30 年代小说史提供了别开生面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照价值,这是可贵的理论创新。围绕“生态文化学”这一重构文学史的核心理念和学术视野,作者依据自己的经验和积累,对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具体理论原则、概念范畴、思维方式,例如“人的文学”、“发现历史与还原生态”、“文学的自由与自由的文学”、“‘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辩证的阐释,提出了不少新见卓识;并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运作思路,即以多元文化主义眼光去发现、呈现、还原、建设文学史和以经验主义触摸、体验与归纳去取代建构主义的命名、定性与演绎而感受、贴近文学史,这无疑是重写文学史的方法论上的更新。文学史观念或方法论的创新对于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固然重要,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研究主体能否将其与研究对象即 30 年代文学有机结合起来而创造出新的文学史文本却更需要学术智慧和功力。也就是说,“生态文化学”作为重构 30 年代小说史的文学史观、理论视野和价值体系,其建造功能、组织机制、整合作用或思想穿透力阐释力,如何通过研究主体的匠心运作和成功实践,转化为文本的逻辑框架、思想线索、思维方式或具体的史识史魂,贯穿于全书的整体结构或渗透于章节之中,天衣无缝地把本书联结成浑然一体的话语系统,尤其各章各节的逻辑链条既能穿越障壁又能环环相扣,使“生态文化学”文学史理论模式与研究对象“30 年代小说”融为一体而没有若即若离的疏游之感,作者对此是下了深工夫和细工夫的,并呈现出诸多鲜明的书写特点或创新之点。

根据“生态文化学”文学史理念所建构的与 30 年代文化思潮、小说理论

和创作形态的客体结构相吻合的逻辑框架,使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各自回归到原生态的位置,史识源于丰盈的史料,史料被史识所激活,研究主体始终坚守以史带论、以论驭史、论从史出、史论并举的叙史原则。这种文学史体式的着力创新点正体现了“生态文化学”作为文学史观的构造威力,它不同于以左翼文学为核心的叙史范式,只突显“革命文学”而遮蔽其他文学形态,也不同于以五四文学为核心的书写模式着重突显“启蒙文学”而忽略其他文学样态;以“生态文化学”建构的文学史体式则是依据“存在即合理”的原则,一视同仁地公正公平地对待和评述 30 年代所有形态的文化思潮及其所孕育出的小说文本,使之各就其位各复其态,从而走近历史贴近历史,使这种体式书写的文学史不再让那种“恢复历史本来样子”的学术追求永远成为史学的乌托邦。此其一。在“生态文化学”理论视野的烛照下,研究主体既不满足 30 年代文化文学已有的资料汇编,又不满意既成的 30 年代文化文学的研究成果,而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务实求新的学术渴望一头埋进图书馆的特藏书库,从那些尘封的 30 年代出版的杂志或书籍中去感受、去体悟、去搜求、去钩沉、去梳理、去辨识——生成于特定文化语境和特定时代氛围的五种形态的哲学文化思潮,或探察其以何种结构方式形成了有利于小说生成的文化生态环境,或重新发现自由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化、市民主义文化等的原创价值内涵,或重新阐释评述民族主义文化、三民主义文化的有益之处,这既发掘出一些新资料又生发出一些新观点,也形成一些新的阐释思路。也许因为 30 年代的文化生态的构成极其错综复杂、悖论百出,后来的评述更是众口不一、分歧极大,故而该书对各种文化思潮的探源颇见力度,对其评析颇见深度,语言表述清晰而丰实。同时,该书还勘探了与五种形态的哲学文化思潮紧密相关的文学思潮,除了对不同理论形态的文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本体内涵进行重新开掘与阐述外,还根据其诗性特质将其概括为“无产阶级小说学”、“生活诗学”、“有根的诗学”等美学范畴;而这些理论范畴的发现与提出都与 30 年代五种文化思潮构成的文化生态直接相关,即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思潮就能孕育出什么样的小说美学,而小说美学正是文化思潮在小说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并为不同样态的小说文本的创造提供了美学规范。论著不只对哲学文化思潮与文学思潮之间的深微关系作了探索,而且对各种形态的小说美学或诗学的独特内涵作了富有新见的理论阐释。此其二。以“生态文化学”为制导而对 30 年代五大主题进行重新探究和书写,论著是遵循哲学文化思潮、文学理论思

潮和小说创作形态这三大逻辑层次,由宏观到微观、由理论抽绎到文本剖析,层层深入地推进;而对小说文本的解读并非五种形态的小说全部纳入研究范围,乃是从不同样态的小说文本中选取那种有代表性的或者被历史湮没的或者被传统史学范式遮蔽的小说,进行个案分析,由“点”的深入透析以窥测小说的艺术全貌和共有特色,特别是对入选的小说文本所进行的体验解读或评点式分析或印象式评述,都读出了、析出了、评出了新意,将30年代小说研究由个案剖析而带入了一个有可能全方位创新的学术境界。在“生态文化学”视野的总览下,由哲学文化思潮、文学理论思潮与小说创作形态的相互联动所构成的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的史论文本,伴随着主体思维的纵横穿越、锐意求新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必须有相应的语言予以准确的表述,使新体验、新史识以新话语得到彰显;《主题研究》的语言、修辞和逻辑颇见功力,形成一个与思维运作相吻合的精练朴实且有文采的话语系统,尤其那些描述主体感受与体验的笔锋常常是情理交融、议叙结合、史中有识、识中有史。此其三。

以“生态文化学”作为文学史理念而对30年代小说主题进行研究,仅仅是李钧博士试图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初步的又是成功的尝试。尽管在尝试中尚有可挑剔之处,如新文学史理念与研究对象相互融合所达到的有机统一程度、对左翼文学进行当代反思所达到的力度、理论创新所达到的逻辑深度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与细化;但是从总体来看该书确是创新趋优之作,充分显示出作者具有独立驾驭重大研究课题的气魄、胆识和才华,更富有那种虚心好学、勤奋向上、废寝忘食、深钻苦研、为文去忧、唯书是乐的“真学者”(梁启超语)的治学精神。这正是李钧在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所言之感:“2004年秋天博士论文开题后,我就一头扎进图书馆特藏书库,准备攻下第一批26种民国报刊。……每天七个小时,雷打不动。不时发现优美作品,内心快乐无比,这时候觉得:选择了文学,是一种幸福!”有了这种境界、这种毅力,还有攻不下的人文科学堡垒吗?李钧博士带着饱满的学术激情和雄心大志,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屡试锋芒屡见成效,在来日方长的学术征程上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他也会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成为学界名副其实的后起之秀!是为序。

草于2006年酷暑

序二 建构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形象”

吴义勤

2003年春夏的“非典”可以说是中国人新世纪面临的第一场灾难,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得不笼罩在它的阴影里。在这一年,山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招生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也只能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考生们冒着“危险”参加了笔试和面试。那种场景,现在回想起来还很有悲壮的感觉,作为教师,我们真的很希望考生们全都有一个好的结果,但由于山师的博士生名额向来有限,最后的结果当时也不敢多想。幸运的是,那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名额,我们专业共招进了22名博士生,算是创了一个“全国记录”。

说实话,要对22名博士生一下子就很有印象这很困难,但李钧谈吐的谦逊得体和学业背景的优异还是让我在第一时间对他很有好感。后来,随着课堂内外交往的增多,李钧的优异学术素质开始引人注目。首先,因为他有着多年的高校工作经验和文学研究经历,他对博士学业的珍惜和对学术的投入都较别人突出。他是一个有思考的学生,但同时他更愿意把时间放在图书馆的特藏室里,这种学术积累的方式无疑是我们所欣赏和提倡的。其次,他为人朴实、大度,很有大哥风范,在同学中极有人缘,教师们也是交口称赞。当然,这些东西对一位博士生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我们常说,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但不必讳言的是,博士的学业仍然是我们最最看重的。李钧的优秀自然还是表现在他的学业上。

我最初接触的李钧的文章是他的两篇书评,一是对孟繁华的《众神狂欢》的评论,一是对林建法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的评论。说起来,仅仅是两篇小文章,但由于书的作者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就特别留意了一下。李钧对对象的把握和表述都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既不乏热情,又很适度、到位,两位朋友也很认真地向我打听他的情况,文章更是被全国各大报纸、网站广泛转载。许多人都瞧不起书评,但其实小小的书评是最不易写好的。从李钧的这两篇书评,我初步领略了他的才情和才华。再后来,他交了一篇关于臧克家的课程论文,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对臧克家诗歌的理解都令我大开眼界。当时,《理论学刊》向我约稿,我毫不犹豫地把这篇文章推荐

过去,很快得到录用,并在2005年度的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奖中荣获了三等奖。这真是很不容易,山东省的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奖有时连《文学评论》的文章都不能得奖,足见李钧这篇文章的优秀。

李钧的博士论文《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是一篇很有创意的论文。说起来,这篇论文的选题与我也有一点关系。那年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评审,李钧申报的就是这个题目。社科项目的申报向来竞争激烈,不少教授都屡次空手而归。作为一个在职博士生要申请立项,难度可想而知。但李钧的选题以其创新意识和学术勇气引起了评委的浓厚兴趣,经过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这个题目最终成功地被批准立项。人们常说,一个好的题目是一篇文章成功的一半。李钧有了一个好题目,但这个题目难度很大,要做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我前面说过,李钧是一个知道如何刻苦做学问的人;也好在,他有朱德发教授这样的学术名师的指点,论文完成得相当漂亮,无论是评议、评阅老师,还是答辩委员会都对于这篇论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在我看来,其论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其一,创新性地提出了文学史研究中的“生态文化学”理论,从而为克服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困境指明了一条超越性的路径;其二,“五大主题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忽略和遮蔽的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进行了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重读与重新阐释,还原了文学史的真相,建构了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形象”;其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文本的重新发现与解读,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与新的可能性。当然,这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显然远不是我这三点所能涵盖的,考虑到朱德发教授已经写了全面评价这篇论文的“长序”,我也就不在此饶舌了。

现在,李钧的博士论文就要付梓出版了,我很为他高兴。他让我为他写序,我是推了又推,但终究还是没能逃掉。我的想法是,这本书的“序”有了朱德发教授的就足够了,因为我知道,朱德发教授作“序”一向很认真,他的每一篇“序”都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长文,而我偏偏又不会写“序”,我的干巴巴的文字与朱老师的“长序”放在一起不仅给人画蛇添足之感,而且相形见绌,也有损该书的学术形象。另外,我和李钧这样的青年学人本来就是朋友和同行,大家相处得从来就很随便和自由,突然要一本正经地“作序”,实在有点不习惯和不自然。但不管怎样,对这样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祝贺的话总是要说的,我之所以写下这些与该书似乎无关的话,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一下祝贺和期待的意思,相信有了这样一个优秀的起点,李钧一定会对于中国当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6年夏勿就于山东师范大学

目 录

序一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及其文本的成功尝试	朱德发(1)
序二 建构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形象”	吴义勤(1)
绪论 “生态文化学”: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理路	(1)
一 意识形态化: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困境”	(2)
二 “生态文化学”的逻辑与历史之“真”	(5)
三 “生态文化学”的社会与伦理之“善”	(8)
四 “生态文化学”的文化与艺术之“美”	(10)
五 “生态文化学”内涵与 30 年代小说的五大主题	(12)
第一章 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	(16)
第一节 “国家第一”:30 年代民族主义思潮	(16)
一 孙中山的革命民族主义与蒋介石的“法西斯民族主义”	(17)
二 “新生活运动”与民族伦理建设	(22)
三 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文学	(23)
第二节 宏大叙事:民族主义文学概观	(26)
一 短促的“三民主义文学”运动	(26)
二 “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30)
三 国防文艺与救亡文学	(36)
第三节 王平陵、黄震遐与陈铨:民族主义小说个案研究	(40)
一 民族主义文学的领航者——小说家王平陵论	(41)
二 “一个人的抗战”:黄震遐小说重读	(46)

三	从人性分析到民族性探讨:陈铨 30 年代小说摭谈	(52)
第二章	阶级革命:翻身解放的梦想	(62)
第一节	另一种西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62)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及其难题	(63)
二	国际左翼文坛与中国革命文学	(68)
三	人民性·阶级性·党性:无产阶级文化的逻辑演化	(71)
第二节	社会学诗学:无产阶级文学摭论	(76)
一	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超越	(76)
二	与“自由人”论争的背后	(78)
三	革命美学与无产阶级小说学	(87)
第三节	茅盾、蒋光慈与丁玲:无产阶级文学个案研究	(91)
一	超越“五四”的努力: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茅盾的三部长篇小说	(92)
二	“中国革命史上的证据”:蒋光慈小说主题模式	(101)
三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 30 年代小说创作得失	(106)
第三章	启蒙主义:“五四”传统的赓续与绵延	(115)
第一节	人性解放:启蒙主义在 30 年代的新发展	(115)
一	“人的文学”:启蒙主义精神与民主主义作家	(116)
二	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后期文学研究会与启蒙传统	(120)
三	从“无政府”的方向看过去	(124)
第二节	全盘西化:30 年代的自由主义运动与自由主义文学	(128)
一	自由主义的艰难步履	(128)
二	“自由”的局限	(138)
三	从《新月》到《独立评论》:30 年代自由主义小说概览	(141)
第三节	巴金、储安平与凌叔华:30 年代启蒙主义文学个案研究	(146)
一	孤独的布道与绝望的殉道:巴金“革命三部曲”与“五四”文学主题比较	(146)

二	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作为文学家的储安平	(153)
三	女性·妻性·母性:凌叔华小说的女性视角	(158)
第四章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与生活诗学	(167)
第一节	市民社会:体制外的政治势力	(168)
一	“市民社会”及其意义	(168)
二	30年代的上海市民社会	(171)
三	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学	(175)
第二节	生活诗学:市民文学创作现象概览	(178)
一	都市里的“新感觉”	(179)
二	民国武侠小说的天地	(184)
三	市井细民的新鸳鸯蝴蝶梦	(188)
第三节	穆时英、李寿民与张恨水:30年代都市小说个案研究 ...	(191)
一	“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小说论	(191)
二	还珠楼主与现代武侠小说:以《蜀山剑侠传》为例	(198)
三	“总结了一个时代的小说家”:张恨水《啼笑因缘》再解读 ...	(202)
第五章	文化中国:30年代的“寻根文学”	(210)
第一节	精神还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210)
一	文化守成:文化民族主义	(210)
二	旧邦新命:“十教授书”的意义	(213)
三	民粹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根性	(215)
第二节	“有根的诗学”:本土文化派小说概论	(217)
一	文化寻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再造	(217)
二	写意小说:“中国小说学”的构建	(220)
三	大地民间: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	(223)
第三节	废名、沈从文与萧红:“寻根派”小说个案研究	(226)
一	摩诃诗画的现代版:废名《桥》解读	(226)
二	乡下人的童话:沈从文《边城》解读	(233)
三	民族生存状态的散点透视:萧红《生死场》解读	(238)

结语 “人”的文学:生态文化学视阈中的 30 年代小说	(245)
一 生态文化学:一种往返质疑的研究思维	(245)
二 发现历史与还原生态	(249)
三 文学的自由与自由的文学	(253)
四 “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	(254)
附录 专家鉴定意见(摘要)	(256)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65)

绪论 “生态文化学”： 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理路

“生态文化学”理念源出于社会学术语“文化生态学”，但是两者的内涵与外延在本书中有着明显学理区别。

“文化生态学”的重心在于生态学^①并在原初意义上具有地理环境决定论色彩。“文化生态学”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进入中国后一度引起学界重视。首先，冯天瑜先生将其应用于“中华文化史”研究并努力超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以“创立文化生态学的中国学派”。其次，文艺理论界受“文化生态学”启发创建了“文艺生态学”。鲁枢元将其校正为“生态文艺学”并认为它“是一种更看重文学艺术内涵的文艺批评”，^②“是生态批评的理论形态，指的是用现代生态学观点，考察文学艺术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的精神状态、与文化生态的关系，研究生态文艺与文艺生态现象的一种边缘性的文艺理论”^③；鲁枢元还总结出了“生态文艺学”的十大基本原则。^④从“文化生态学”到“生态文艺学”已发生了跨语境的移步变形，也为“生态文化学”命题奠定了前提。

本书提出“生态文化学”命题具有如下学术目标和方法论意图：首先，“生态文化学”是针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困境”而提出的应对策略。其次，学界此前引入“文化生态学”并生成“生态文艺学”时多沿用西方话语，并未进行本土化的学理论证。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人类学、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说：“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用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生态理论研究文化产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418页。

②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的原则》，《新东方》（社科版）2001年第1期，第10页。

③ 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3年第1期，第6页。

④ 鲁枢元：《文学艺术批评的生态学视野》，《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第41～42页。

历史哲学等基本理论对“生态文化学”进行逻辑与历史、社会与伦理、文化与艺术等不同层面的理论整合,在“真善美”品格上确立本命题成立的可能性、可行性与必然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三,以“生态文化学”理论对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群落进行宏观扫描会发现其文化生态的立体结构和多彩景观;“生态文化学”带来的开放性、立体性、综合性的研究视野将超越“文化生态学”的局限,并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 意识形态化: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困境”

“政治意识形态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特征。强调世界观的纯粹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曾在中国革命胜利和特殊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军事化也必然贯彻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毛泽东在1940年代就认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①;必须破坏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文化,“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②解放区文艺路线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一体化,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组织1948年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又为国统区作家指明了“文艺的新方向”。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指出,在“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的时代,能够抵抗那历史的压力和创造新时代的,只有那最强大的阶级力量,群众力量”。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批判了“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文艺”并以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对其进行了描述。革命理论家“自信地站立在‘时代的巨流’之中,要求以一种文艺理念来统一‘多种形态’、‘各种不同的倾向’,势必将文坛的派别之争、文艺观念和创作倾向的分歧引向一种‘铲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方式。”^③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主要观点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大众文艺丛刊》指出的“文艺的新方向”如出一辙。大陆文艺界20世纪50年代经过批《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反右”等文艺运动终于建立起一体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③ 贺桂梅:《转折的年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在此形势下,1951年开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客观上形成了重论轻史、重观点轻资料的偏向。在学术上,势必产生一种研究程序、一种治学的途径。这便是论在史先,先论后史,史为论存,史以证论,便引出了‘以论带史’的方法,而且发展为‘以论代史’,成了建国后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研究方法,至今不衰”^①。经过主流意识形态过滤和净化,现代中国文学史被置入僵硬的叙述模式中。以20世纪30年代文学研究为例,这十年常被简化为“左翼十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称之为“左联十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则作了如下描绘:“这是中国革命力量遭受了挫败而仍在继续深入地发展的时代;这是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和推动革命的新高潮的年代;这是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以白色恐怖残酷地镇压中国革命、大规模地屠杀广大革命群众的年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卖国政府,强占了我国东北,并想进而席卷全中国的年代,同时,这也是我们伟大的奠基者和导师——鲁迅在党的领导之下号召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向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帮闲的走狗进行坚韧不屈的战斗的年代。”^②这可以代表当时文学史政治意识形态化写作的经典表述。这种一元化的文学史写作一直持续了30年。

新时期以来,学界在反思中试图突破极“左”政治的重围。“重写文学史”口号“实质上提出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这就是文学史写作的大一统局面宣告解构,学人们有权利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写作不能完全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应当尊重文学史的真实状态,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尊重文学史功能的多样性”^③。学界由此努力打破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思维定式并进行了深入而有意义的探索实践,重新确立了“文学是入学”的核心理念,认为“‘人的文学’理念应似中国复杂多样的文学形态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史识’或‘史魂’,而且这一核心文学史意识也是主客观的统一体”;^④同时,文学史写作范式也有了重大突破,“一是再次举起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旗帜,以五四精神传人的姿态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二是强调文学的艺术性,认定文学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以形

①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解构和重构》,《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50页。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页。

③ 朱德发等:《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④ 朱德发等:《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